

潘绥铭 主编

中国 sexuality 研究系列 12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办

Chinese Male Clients: Report on HIV Risks and Prevention

“男客”的艾滋病风险及干预

潘绥铭 黄盈盈 王洁 刘中一

UP

阮芳赋主编 性学万有文库 (030)

高雄 万有出版社 台湾

2008 年 1 月

中英艾滋病防治项目
福特基金会资助出版

“男客”的艾滋病风险及干预

Chinese Male Clients: Report on HIV Risks and Prevention

潘绥铭 黄盈盈 王洁 刘中一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网址：

[Http://www.sexstudy.org](http://www.sexstudy.org)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办

潘绥铭 主编

中国sexuality研究系列11

福特基金会资助

书名：“男客”的艾滋病风险及干预

作者：潘绥铭 黄盈盈 王洁 刘中一

ISBN 978-986-83350-5-6

UP

出版者：阮芳赋主编：性学万有文库 030

万有出版社

地址：高雄市三民区民礼路40号

TEL: (07)385-4553 FAX: (07)615-8001

E-MAIL: universalpress88@yahoo.com.tw

邮拨账号：42199922

户名：万有出版社

名誉社长：林燕卿

社长：张隆基

发行人：萧金柱

初版：2008年1月

CONTENTS 目录

第一部分：本项目的背景

第1章 研究背景：全国男客的总体情况	4
第一节. 数据来源	
第二节. 男人接受性服务的发生率	
第三节. 谁更容易找“小姐”？	
第四节. 男人接受性服务的详细情况	
第五节. 找小姐与性病	
第2章 本项目的的基本情况	23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立意	
第二节 项目的设计与执行	
第三节 男客的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干预模式探索的实践

第3章 接触男客的方法与过程	36
第4章 访谈男客的方法	54
第5章 干预试验的情况介绍	61
第一节 昆明：在访谈过程中所进行的干预	
第二节 个旧：在焦点组访谈中所进行的干预	
第三节 庐州的干预试验：场所内的正规讲课加上分散座谈	
第四节 雅安：非场所中的干预	
第6章 对于干预试验的效果评估	79
第一节 两次问卷调查的可比性证明	
第二节 两次问卷调查中的艾滋病知识情况的对照	
第三节 两次问卷调查中的安全套使用率的对照	

第三部分：风险行为研究与干预模式建议

第7章 风险行为的分析	90
第一节 艾滋病、性病的相关知识及态度（正反两方面的情况）	
第二节 男客们自认的风险	
第三节 男客的性行为分析	
第四节 男客的多伴侣行为	
第五节 性病、艾滋病在男客中的流行情况	
第六节 男客的安全套使用情况	
第七节 安全套使用的综合分析	
第8章 干预模式的总结与建议	117
第一节 干预试验成功的7点原因	
第二节 模式1：依托已有的小姐项目，在娱乐场所中开展干预	
第三节 模式2：由小姐联系与教育男客	
第四节 模式3：在特定风险人群中开展的干预	
第五节 具体干预方法的探讨	

第四部分 继续研究的初步成果

第九章 男人之“性”的社会建构	148
第一节 中国男人的“性”的历史遗产	
第二节 当前中国男人的性关系的建构	
第十章 男人“找小姐”的社会机制	157
第一节 全国2006年的情况	
第二节 找小姐的“理论指导”	
第三节 “找小姐”行为的建构	
第四节 男人找小姐的主体价值	
第五节 男客的种种心理上的抑制因素	
第十一章 找小姐中的风险行为	178
第一节 男客的性行为分析	

第二节 各种性行为

第十二章 对干预工作的启迪 183

第一节 使用安全套的社会机制
第二节 低阶层男客应对性病的策略
第三节 男客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
第四节 男人：预防艾滋病的最重要的知识
第五节 促进低阶层男客使用安全套的对策建议

附录1：参考文献

附录2：定性访谈的提纲

附录3：现场原始记录举例

附录4：各试点原工作基础文件（当地已有的成功经验）

附录5：干预男客可用的顺口溜

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专项基金

编号：2004-TS-C2-012 (11.5)

“男客” 的风险行为研究 与干预模式的探索

项目总结报告

报告人：潘绥铭、黄盈盈、刘忠一、王 洁、
童明德、孔祥俊、车学继、李光忠

所在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

项目时间：2004年11月-2005年11月

报告日期：2005年7月7日

修订日期：2005年8月13日

致 谢

本项目受“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专项基金”的资助。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得到国家项目办、云南省项目办、昆明市项目办（白马项目）、个旧市项目办（妇女健康中心项目）、四川省项目办、泸州市项目办（弩马项目）、雅安市项目办（小雨点项目）的负责人与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我们的工作很难完成。

我们要强调的是，上述各个地方的项目，已经开始对于男客的调查与干预工作，有些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放眼一望。

我们尤其要感谢以下人员的特殊贡献（以地区分布为序）：张云、顾仪、车学继、杨玉蓉、李光忠、郭嫚、文莉筠、小婷、童明德、张丽莎、李雪年、孔祥俊等。

我们还要非常感谢老中先生的无私的大力支持。他帮助我们访谈了高层访谈对象。

同时，还要感谢积极帮助我们介绍访谈对象的杨妈咪、王经理、小马经理、李经理、“疯哥”、陈老板、赵工头。

感谢我们所进入的各个场所的老板们与小姐们。

最后，非常感谢参与本项目的访谈与干预试验的男性朋友们。

第一部分

本项目的背景



第一章 研究背景：全国男客的总体情况

第一节 数据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组织了专业调查队伍，于1999年8月到2000年8月进行了全国随机抽样调查。我们的调查可以代表全体中国成年人。在我们的样本中，男性占50.2%，女性占49.8%。以下关于男客的所有情况与统计数字，均出自这次调查。（具体情况，请看潘绥铭等：《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已经全部上网：<http://www.sexstudy.org>）

调查总体的确定

我们确定为20岁到64岁的中国总人口。

之所以从20岁开始，是因为年龄再小的中国青少年，有过性行为的比例极低，我们的大多数提问都不适用于他们。同时，在我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里，20周岁以下的人口即使发生过性行为，由于种种压力，也很难真实地回答我们的调查。

反之，如果他们（她们）确实没有性行为，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调查就可能产生反感甚至是抵触情绪。两者都会减少调查数据的可靠性。我们确定的20岁是女性的法定允许结婚年龄，可以减少阻碍与麻烦。

按照一般的看法，55周岁以上的人口就已经是处于“性不活跃期”了。我们之所以确定为到64岁结束而不是更早，是因为我们希望调查解放初期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人的情况，而他们到1999年的时候还没有超过64岁。

之所以没有调查更老的人，则是因为对于64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即使他



们（她们）仍然有性生活，我们调查这样敏感的问题，也会引起反感甚至抵触。

抽样方案的设计

抽样方法是：按照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以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为分层标准，侧重东南沿海地带，总共分为14层；以县级地区为初级抽样单位，抽取60个；县以下使用PPS抽样到居委会或者村，然后依据核实过的居民名单进行等距抽样。我们的抽样误差小于0.04。统计分析时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加权。

在城市中对流动人口进行抽样的方法是：

如果居委会会有完整的流动人口名单，则将其归入居民名单，统一进行等距抽样。这样的居委会占61.7%。

如果居委会没有流动人口名单，则由调查员按照改居委员会的地理范围进行登记和编号，以个人为单位，以在此居住为标准，只记姓；然后与居民一起进行等距抽样。这样的居委会占26.7%。

城市中有些居委会是单位家属院或者封闭小区，不允许任何流动人口居住。这样的情况占11.7%。

样本容量的确定

我们总共随机抽取5000个样本。这是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总人口中性传播疾病的发生率，而它非常低。为了获得足够的分析样本，我们必须确定这个相当大的样本容量。

随机抽样结果的检验

统计之后发现，我们对于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的调查数据，与国家公布的2000年统计数据没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可以表明，我们的随机抽样是精确的，我们的数据足以代表全中国20—64岁的总人口。

①以下的基本情况来自：潘绥铭，（美）白维廉、王爱丽，（美）劳曼：《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41万字。ISBN：7-80190-131-2/B.008。但是在写作本报告时，作者增加了更加详细的统计结果。



调查中采用的新方法

诚然，性大概是最难调查的了，尤其是非婚性关系甚至非法性行为（例如嫖娼），就连我们课题组中的一些同仁，一开始也不相信能够成功。那么我们的“法宝”是什么呢？说来，除了社会学的许许多多标准的调查方法之外，最主要的有三个：

第一个，我们没有到别人的家里去调查，因为谁也不会傻到在自己家里，甚至当着家里人的面，谈论自己的性生活，更不可能说出任何一种非婚性行为。我们是通过预约，主要在下班后和双休日，把人家请到我们所住的宾馆房间里，管起门来，同性别地、一对一地进行调查。

这样一来，时空转换了，外界隔绝了，气氛融洽了，心静自然少忧烦，真实情况也就最可能出来了。这是因为，中国人由于害怕“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所以只能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情况下接受调查。

第二个“法宝”是：我们使用了笔记本电脑进行调查。也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一个接一个地显示在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被调查者通过按键来回答，就像上网浏览各个网站那样。一开始的不敏感的问题，都由调查员一边问一边操作电脑一边教被调查者使用。等到关于“性”的问题开始出现时，就由被调查者自己独自操作与回答了。这时，调查员坐到对面较远的地方，由于笔记本电脑的屏幕（“盖子”）的遮挡，不可能看到被调查者的任何回答。

不识字怎么办？我们有耳机，可以从电脑里听到宣读提问的声音。不懂普通话怎么办？我们有4种方言的声音。无论如何也不懂怎么办？那就只好由调查员来一点一点解释和询问了，最长的问了接近3个小时。不过，这种情况我们只遇到千分之四。

第三个，在调查中，我们派去上门预约的人（会知道被调查者的住处），绝对不是最终进行访谈的人。因此，最终访谈者根本不可能知道被调查者的姓名、住址等情况。

这是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另外一个普遍心理：只有面对那些素不相识、萍水相逢、永不再见的人，才能对社会敏感的问题说出真话（想想火车上的聊天），因为这样的人不可能知道我是谁，也就不可能威胁到我。我们向每一个被调查者都说明了这一情况，而且被调查者自己也可以亲眼看到与核实。这就做到了最彻底



的保密。这一措施对我们的调查成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样一来，我们就最大限度地适合了中国的一个国情：在性问题上，“许做不许说”。

应答率

我们的有效应答率是76.3%（3822个样本）。此外，我们在调查过程中，还采用了其他3个指标：

抽中率：随机抽样抽到的人里，有多少人真的能够找到。我们只能找到92.3%的人。

预约成功率：到被抽中者的家里去预约的时候，答应前来接受调查的比例。我们的成绩是85.5%。

现场到达率：最终实践诺言，前来参加调查的人的比例。我们得到了77.4%的结果。

到达现场之后，或者开始调查之后，还会有些人仍然拒绝回答。在统计分析的时候，再删除必须作废的回答，最后才得到76.3%这个有效应答率。

从上面的几个成功率可以看出：1999年到2000年的普通中国人，对于性这个话题其实并没有那么保守和敏感。只有7%的人是在刚刚预约的时候就断然拒绝。虽然还有8%的人最终没有前来，但是其中的大多数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其他原因，并不是因为对于性的敏感。尤其是在南方沿海地区，我们所损失的应答率，几乎全部是因为找不到人、太忙不肯来等等原因。也就是说，中国人其实还是很坦诚的。他们要么根本就不来，来了就会同意被调查。只有那些到了调查现场再拒答的人，才是毫无疑问是真的对性问题讳忌如深；可是他们只占1%。

第二节 男人接受性服务的发生率

发生率

在各种多伴侣性交中，收费的性服务（商业化的性交易、嫖娼卖淫）一直被认为是最容易传播艾滋病的。（尽管中国的预防工作在这方面投入得极少。）那么，社会实况究竟如何呢？



在20-64岁的男性总人口中，承认自己在一生中曾经与“性服务小姐”（暗娼、性工作者，以下简称为小姐）发生过性交合的人占6.4%。

按照年龄组来看，40岁（含）以上的男人中，只有1.5%的人这样做过，而39岁（含）以下的男人中却达到11.2%。在35岁（含）以上的男人中，只有3.6%的人这样做过，而35岁以下的男人中却达到11.9%。其中最高的是25-29岁的人，高达12.7%之多。

从以下的表格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年龄越小的人，“找小姐”的概率越高。

表1-01 自己年龄按10岁分组与“找小姐”（有效样本1913）

	没有	有
20-29 岁	87.0%	13.0%
30-39 岁	90.6%	9.4%
40-49 岁	97.8%	2.2%
50-59 岁	98.9%	1.1%
60-64 岁	100.0%	
总计	93.6%	6.4%

Chi-Square Tests

	Value	df	Asymp. Sig. (2-sided)
Pearson Chi-Square	81.590 (a)	4	.000
Likelihood Ratio	94.073	4	.000
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73.847	1	.000

表1-02 自己年龄老中青与“找小姐”（有效样本1915）

	没有	有
青年 20-35 岁	88.1%	11.9%
中年 36-49 岁	96.1%	3.9%
老年 50-64 岁	99.0%	1.0%
总计	93.5%	6.5%



Chi-Square Tests

	Value	df	Asymp. Sig. (2-sided)
Pearson Chi-Square	71.225 (a)	2	.000
Likelihood Ratio	78.136	2	.000
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66.807	1	.000

表1-03 自己年龄（侧重青年）与“找小姐”（有效样本1913）

	没有	有
20—24 岁	90.1%	9.9%
25—29 岁	87.3%	12.7%
30—34 岁	89.8%	10.2%
35 岁及以上	96.4%	3.6%
总计	93.6%	6.4%

Chi-Square Tests

	Value	df	Asymp. Sig. (2-sided)
Pearson Chi-Square	44.374 (a)	3	.000
Likelihood Ratio	41.967	3	.000
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33.784	1	.000

如果只看城市男性的话，那么35岁（含）以上的人里只有5.5%接受过性服务，而35岁以下的人里却有12.5%之多，也就是大约8个男人里就有一个曾经接受过收费的性服务。其中，25—29岁的人也是最多，高达16.5%，也就是大约6个男人里就有一个。

从收入情况来看，最低收入的那40%的男人，基本上从来没有找过小姐，而收入最高的那5%的男人，则是五个里面有一个找过小姐。

表1-04 自己收入与“找小姐”（有效样本1907）

	没有	有
收入最低的那 40%	100.0%	.0%
收入中间的那 55%	92.2%	7.8%
收入最高的那 5%	79.7%	20.3%
总计	93.6%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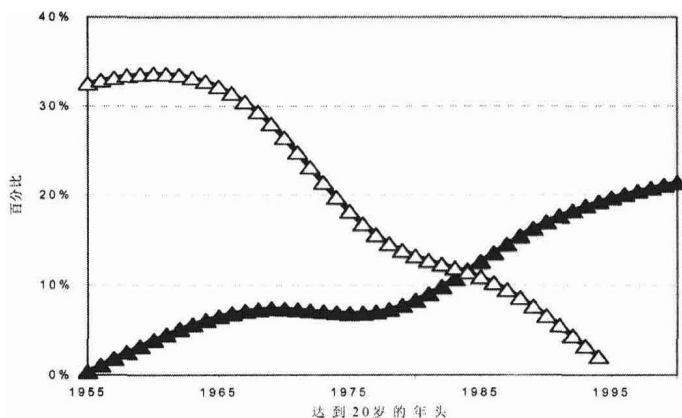
Chi-Square Tests

	Value	df	Asymp. Sig (2-sided)
Pearson Chi-Square	89.051 (a)	2	.000
Likelihood Ratio	109.175	2	.000
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85.882	1	.000

与美国人的比较

在下面的图1-01中，蓝色的曲线是中国的情况，白色的是美国的情况。

图1-01：中国与美国，不同年龄的男客的比例



与美国的情况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在最近40年里，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男人寻求性服务的比例在急剧地下降，可是中国男人的比例却在显著地上升。虽然还没有达到美国1955年的高度，但是在1985年之后却是猛增的状况。

为什么会这样？恐怕只有一个解释：

美国自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性革命之后，一般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日益开放，爱情的旗帜不断高扬，因此男人们会觉得：明明可以有女性性伴侣，却非要去花钱找那些没有爱情可言的性服务小姐，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可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即使在今日，一般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也仍然不可能很开放，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男人去寻求性服务。



也就是说，从整个中国社会剧变的角度来看，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之中：严厉“扫黄”在客观上就是鼓励一般男女的性关系开放；反之，严禁一般男女的“性开放”实际上就是为性产业开辟市场。

第三节 谁更容易找“小姐”？

在一般舆论中，男人“找小姐”似乎是“本性难移”，甚至有许多人相信：每一个男人都会“找小姐”的，只不过因为要花钱、有风险和可能得性病，才有些男人不去做。

这无疑是片面的。我们通过logistic回归发现以下一些情况（具体过程从略）。

什么样的男人最容易“找小姐”

第一，男人是否与小姐性交过，最主要的因素是：他是不是经常单独外出（在外面过夜的才算）。与那些出来没有外出过的男人相比，外出1-3个月的男人，“找小姐”的可能性是前者的6.6倍；外出超过6个月的则是7.2倍。

与此相类似的是：社会交往越多的男人，“找小姐”的也就越多。每周社交2-3次的男人，与那些从来也不设教的人相比，“找小姐”的可能性增加4.5倍。此外，抽烟多的男人，“找小姐”的也多，是不抽烟的男人的2.7-2.9倍。这是因为抽烟多少与社交多少直接相关。

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三个因素综合起来看，才能发现问题的实质。男人“找小姐”，并不是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机会多（单独外出过夜多），还要看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如何（经常社交可以培养这种能力）。这是因为，“找小姐”并不是像到商店里买东西那么简单，更不那么容易。它毕竟是一种人际交往。有些男人是因为“没本事”才没有去做，而不是因为“没胆量”和没机会。

第二，我们发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第二位的因素。在男人所居住的社区里，“找小姐”的人越多，他自己也去“找小姐”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具体来说就是：社区里接受过异性按摩的其他男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自己“找小姐”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17%；社区里找过小姐的其他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自己也这样做的可能性就会增加32%。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说明：现在的男人越来越变成一种“社区人”